

指引长征胜利的灯塔

——毛泽东同王明、张国焘错误

路线的较量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长期革命战争中的一次极其光辉的伟大革命实践。毛泽东从政治、军事和组织上战胜王明、张国焘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粉碎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把党和红军重新引向胜利，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王明等人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否定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特点，低估了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主张立即进攻中心城市；他们否定毛泽东的一整套正确军事原则，另搞了一套所谓“新原则”，主张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代替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大搞宗派主义；他们到处派遣“钦差大臣”，强制推行其错误路线，企图按照他们的面目来改造党。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1932年1月，临时中央作出了“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迫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结果使红军蒙受了重大损失。只

是由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央红军才于 1933 年初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 年 9 月，蒋介石以 100 万人的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军事原则”，向中央根据地及邻近的湘赣、闽浙赣等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在敌军步步为营的反动策略面前，仍然盲目轻敌，继续推行冒险主义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打烂坛坛罐罐”、“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错误主张，迫使红军同优势的敌军死打硬拼，结果处处被动，到处挨打，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两个月之后，国民党的十九路军公开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张利用福建事变这个有利时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样，就有可能迫使敌人回援，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并能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然而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们，根本看不到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而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竟把同国民党反动派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以致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一个有利时机。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以后，又回过头来向中央根据地进攻。王明路线的领导者转而实行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以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来对付敌人的进攻。敌人依托堡垒五里一推，十里一进，步步进逼；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不懂得只有集中兵力，歼

福建人民政府，指 1933 年 11 月 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粉碎敌人的堡垒战，反而实行分兵六路，全面抵御，结果给了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到一年时间，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主张立即改取战略进攻的方针，以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是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又拒绝了这个正确主张。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迫使红军只有实行战略转移这一条路了。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直接后果。

红军战略转移开始，主力往哪里去？如何突破重围？这是亟待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也是毛泽东军事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王明路线的领导者这时表现出惊慌失措，他们消极避战，只顾逃跑，夺路突围，企图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军事上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因此，长征初期，红军到处被动挨打，虽然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红军遭到严重损失，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不足四万人。而且这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下重兵，准备聚歼红军，如果继续前往湘西，无异虎口投食，只能招致覆灭。

红军广大指战员已经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在毛泽东领导下，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革命事业就节节胜利，蓬勃发展。王明的错误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就使红军连连失败，陷于绝境。迷雾途中盼太阳，全军指战员迫切要求撤换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热切盼望毛泽东能够回到领导岗位，领导全党，统帅红军。

在党和红军处于危急关头，毛泽东力挽狂澜，提出了停止去

湘西，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战略方向。这个建议，得到了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1934年12月，红军攻克黎平，进入贵州。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向遵义地区前进。1935年1月，红军出敌不意，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从而避免了落入敌人陷阱的危险。

在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地批判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机会主义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正确轨道上来，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喜讯，像春风一样迅速传遍全军。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群情振奋。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洞察全局，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根本战略方针。他率领经过整编的红一方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进入川南，准备渡长江北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几十万重兵进逼包围，妄图聚歼红军于川南地区，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率领红军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英明地组织了四渡赤水 and 抢渡金沙江的战役。这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光辉范例。

在四渡赤水中，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弄得敌人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完全听从调遣，打乱了敌人的整个“追剿”部署，红军由被动完全转为主动。四渡赤水的胜利，为以后执行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会理会议以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扬压倒一

切敌人，战胜一切艰险的英雄气概，又取得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胜利，继续北进。

在胜利地进行了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又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6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

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蒋介石坚持反共卖国政策，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毛泽东根据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争取中国革命的大发展，又及时提出了继续北上到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当时，高居红四方面军领导地位的张国焘，却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吓破了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极力反对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张国焘原是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的“钦差大臣”。他坚决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极力推行自己的一套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路线。他继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又于1935年3月，擅自撤离了川陕根据地，率领部队向西退却。同一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仍坚持他的退却逃跑主义路线，主张向青海、新疆或川康边陲逃跑。是北上抗日还是南下逃跑，这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一场新的两条路线斗争，又提到党和红军面前。

6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毛泽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斗争。他指出，“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到的挫败，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

主运动的高潮迅速到来；而西进或南下，则因脱离了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区和深入地薄人稀的少数民族区域，必将置红军于非常困难的地位。”

张国焘不听劝告，坚持错误，顽固反对北上。他依仗人多枪多，一心改组中央军委，篡夺军权。为了这个目的，他召开反党会议，散布谣言，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

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翻过几座大雪山，于 7 月下旬到达毛儿盖。经过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的反复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四方面军北上。因为时间被张国焘耽误了一个半月，经松潘北去的大道为敌胡宗南部所控制，红军不得不改道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8 月 27 日，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胜利地走出草地，到达巴西，接着在包座歼灭胡宗南一个师，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而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包括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和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则到了阿坝地区。在巴西，毛泽东多次打电报催促张国焘率部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向甘南出击。但张国焘执意向西退却。在党中央一再批评之后，他反而荒谬地要求右路军重过草地南下。在他的无理要求被拒绝时，竟下密令，企图危害党中央，公开进行分裂主义的反党活动。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得悉张国焘的反党阴谋，立即把这一重大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徐向前对张国焘这一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党中央当即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境地，随即率部北上。

9 月 12 日，党中央在川甘边界的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实质是被敌人进攻所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党中央除了给张国焘去电申斥其分裂罪行外，又发出

《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严正指出“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但张国焘决心沿着反党分裂道路走下去，竟然召开与中央直接对抗的“阿坝会议”，反诬北上方针为“右倾逃跑”，并颁布了“大举南进”计划，欺骗和强迫四方面军去实行南下方针，后来竟悍然成立伪中央，自封“主席”，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

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路线阻挡不了红军胜利前进的脚步。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继续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通过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 10 月 19 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在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红一方面军经过历时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陕北红军及由鄂豫皖游击根据地北上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

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共同进行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这次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和红一方面军北上取得伟大胜利相反，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路线导致了惨重失败。南下半年，部队由原来 10 万人减少到 4 万人，陷入进退失据的困难境地，被迫向甘孜地区撤退。

1936 年 6 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张国焘南下失败，在党中央严肃斗争下已被迫取消伪中央。由于毛泽东、党中央再三督促，由于朱德、刘伯承和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等的坚决斗争，也由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张国焘被迫同意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 年 10 月，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

区，与前来接应的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但张国焘野心不死，又擅自密令四方面军由靖远西渡黄河，企图经甘肃西部向新疆逃跑。在一部分部队渡河之后，因敌情变化，张国焘本人和两个军才留在河东。但已经渡过黄河的西路军部队二万余人，在敌人的围攻之下惨遭失败，这就宣布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最后破产。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1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地进行了山城堡战役，全歼敌一个整旅零两个团，击溃另外的两个师。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在帝国主义策动下，蒋介石动员的全部的反革命力量，对红军进行了10年之久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的反革命企图，终于被最后粉碎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向全国大发展的光辉里程。

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

——
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与林彪
机会主义的败露

林彪在长征途中表现出机会主义错误，是在紧接遵义会议以后。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在这里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正确轨道上来。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举歼灭和击溃蒋军主力吴奇伟等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重兵之间，迅速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敌人以为红军向东，红军偏偏在西面出现；敌人以为红军要渡江北上，红军却又向南回击。红军生龙活虎，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直插云南，于 5 月上旬，全军仅凭七只小木船，胜利渡过金沙江，把几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远远甩在后面，敌人围歼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了产。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的战役，是毛泽东用兵如

神的光辉范例，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这种情景，同遵义会议以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红军所处的被动局面相比较，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红军广大指战员从一正一反的亲身体验中，深切感受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完全正确，指挥非常英明。当时，全军上下信心百倍，衷心拥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但是，就在红军转败为胜、局势开始好转的时候，在一军团

任军团长的林彪，多次跳出来，明枪暗箭地反对毛泽东的指挥，反对正确的军事路线。在红军四渡赤水之战中，林彪情绪消沉，既怕苦又怕死，该走时他不愿走，该打时他不敢打，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却反对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继续推行王明的逃跑主义路线。当时，为了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在高度运动中寻求有利的战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要求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在于使敌人无法判断红军的行动意图，以便力争主动，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然而，林彪却把毛泽东的指挥认为是“走弓背路”，“造成疲劳”，“会拖垮部队”，一再鼓吹“走捷径”。按照他的错误主张，结果只能造成于敌有利、于己不利的被动挨打局面。毛泽东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对林彪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并以非凡的机智，克服由于林彪的干扰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使红军不断取得胜利。

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川南会理地区后，他就吵吵嚷嚷，煽动对毛泽东领导的不满。一到宿营地，林彪竟然给在三军团任军团长的彭德怀打电话，叫嚷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结果，遭到彭德怀严厉拒绝。林彪打电话时罗瑞卿在场，亲眼看到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党的原则，同林彪作了坚决的斗争。聂荣臻严肃地批评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你要造反，办不到！”林彪不但拒绝批评，打完电话，马上又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信，狂妄地提出要毛泽东下台。他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名，当即遭到拒绝。聂荣臻义正词严地斥责林彪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指出：“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

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在毛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林彪根本听不进这些话，他一个人在信上签字，就把信发走了。当时，遵义会议开过不久，统治党长达四年之久、给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王明机会主义集团，虽然被赶下了领导岗位，但他们那条错误路线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些人利用当时的困难处境，要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刚刚确立，亟须全党全军同心同德，紧密团结，听从他的指挥，以战胜面前的强敌，开创新的革命局面。况且当时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红军处境仍然危急艰难。

在这革命的严重关头，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城郊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林彪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批评。毛泽东针对林彪散布的所谓会“拖垮部队”的谬论，严肃驳斥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周恩来在会上揭露了林彪的阴谋，旗帜鲜明地捍卫毛泽东的领导。会议明确指出，林彪带头反对毛泽东，不仅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上是机会主义的，在组织路线，也是社会主义的。会理会议，坚持了原则，战胜了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捍卫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林彪在会理会议前夕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林彪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是一贯的。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就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对中国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散布了许多悲观论调。他一遇敌情严重就想逃跑，多次要离开部队，分散打游击。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长信，就是批评林彪的。1931

年，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林彪又紧跟王明，积极为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效力。在五次反“围剿”中，他抛出《论短促突击》一文，公开为王明错误路线辩护，攻击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了”。在遵义会议上，林彪态度暧昧，实际上是继续站在王明路线一边。遵义会议开过短短几个月，林彪就公然跳出来，反对毛泽东，这正是他一贯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一次集中暴露。

会理会议以后，林彪不是改弦更张、弃恶从善。他对毛泽东、党中央的严肃批评，对会理会议的正确结论，怀恨在心，许多活动并没有收敛，而是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坚持错误立场。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极力反对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阴谋分裂党，分裂红军。林彪极力吹捧张国焘的路线。毛泽东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林彪只看张国焘人多枪多，一心想投靠张国焘，张国焘也拼命拉他。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还把林彪列为伪中央委员和伪军委委员。

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提出要发展和巩固陕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高潮。林彪对抗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个月内8次写信、发电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决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根据地，到陕南去“打游击”，他甚至威胁中央，“宁可忍受处分”，也不留在陕北。

林彪这一系列活动，都是确凿无疑的铁的事实。但是，长期以来，他采取极其卑鄙的两面派手法，把自己的丑恶历史掩盖起来，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他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一贯“高举”、“紧跟”装出最最“革命”的样子。其实稍微了解底细的人都知道，他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历史检验了林彪的一生。

领袖与人民意长 主席与战士情深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生活中的几个片断

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指挥和影响下，中央红军取得了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致使根据地连连失守，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18日开始进行长征。

由于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长征开始时，红军继续遭受重大损失，连打败仗，八万多人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三万多人了。可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者，在湘江战役后，依然一筹莫展，只是命令红军硬打硬攻，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的会合上。当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会师，在二、六军团和中央红军之间的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一带，集结了三四十万人马；同时命令广西军阀向西延、龙胜一带追击，企图围歼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采用硬打硬攻的笨战法，势必要与大于红军七八倍的

敌军作战，那么剩下的三万多红军，显然有覆没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在行军中研究了情况，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红军渡过乌江之后，仅用10天时间，就占领了贵州北部的战略要地——遵义城。

1935年1月6日清晨，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遵义城。当

天下午，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骑着战马，风尘仆仆，随着整齐的红军队伍进城了。

毛泽东到遵义后，住在旧城的一幢楼房里。他刚把东西放下，连饭都没顾得上吃，便到河对面的总部开会去了。

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开得十分紧张、激烈，每天总是开到下半夜还不散会。有时连饭都要公务员送到会议室去吃。会议的气氛也非常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有些领导发言激动得站起来。

那几天，中央在开会，而红军中的每一个人，都十分关心会议召开的情况，就连炊事员给战士打饭时，也要问上几句。当时，人们想的是：过去跟着毛泽东天天打胜仗，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使红军拼得只剩下三万多了。如今不知毛泽东能不能回到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岗位上，继续率领红军前进。

会议是1月15日开始的。争论十分紧张、激烈。很少有休息时间，过度的操劳使毛泽东消瘦了，周恩来眼睛熬红了，朱德身体还结实，但神情很严肃。会议实在太紧张了，连公务员和警卫战士端进去的开水，首长们有时都顾不上喝。到第三天，也就是1月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胜利闭幕了！

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时，广大指战员好像拨开了重重云雾，看见了鲜红耀眼的太阳，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切疑团和不满情绪都一扫而光了。特别是向各部队宣布了决定后，全体指战员兴奋、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党在经历艰难曲折的道路，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当时，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指战员欣喜若狂的议论。

1月17日下午，在遵义东城协台坝第二中学学堂门前的大操场上，召开了遵义城从来没有过的万人群众大会。毛泽东虽然几

夜不曾合眼，但他只在住房里稍微休息一下，就和周恩来、朱德一起去参加大会。当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登上主席台时，全场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在这次万人大会上，他们 3 个人都讲了话。从此以后，中国革命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红军在遵义进行了短暂休整之后，继续前进。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红军声东击西，迂回甩敌，四渡赤水河，巧过金沙江，进入了西南部的彝族地区。

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族人民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后，来到了擦罗场。当时敌情万分紧张，后有数十万敌军追来，前有四川军阀扼守着大渡河的所有渡口。因此，毛泽东和总部首长研究决定，急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进发，并且命令：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两根毛竹。

毛泽东执行命令一贯是全军的表率。他事先给自己找好了四根毛竹，比别人多拿一倍。出发后，毛泽东看见背负过重的战士和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又替他们背枪、背米。几个警卫员知道主席经过一整天强行军，已经是相当疲倦了，便再三要求主席给分出两根毛竹来。可是毛泽东不同意，他边走边说：“执行命令，大家都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力气。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嘛！”

当毛泽东登上擦罗场西北方的一座大山时，突然遇上了狂风暴雨。本来路就不好走，大家背负又重，再碰上这样恶劣的天气，行军就更加困难了。但是，战士们在毛泽东的鼓舞下，展开了一个“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让每个战友都安全按时到达大渡河”的运动，很快就把一座上十五里下十五里的大山甩在后边，进入了一片大森林。

在这密林深处雨夜行军，既找不到干柴引火照明，又找不到当地的向导带路，是最容易迷失方向的。果然走了没多久，前面

的部队就停下来了。总部请示毛泽东后，命令部队就地宿营，天明继续前进。毛泽东把肩上的四根毛竹拿下来，靠在身边的一棵大树上，然后抖了抖他那把已经破了的雨伞，招呼大家说：“来！我们也学习战士们那样，围在这棵大树下，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几个警卫战士都跟着蹲下来，把毛泽东围在中间。这时，借着闪电的亮光，隐隐看见邻近大树下的战士们已经睡着了。过了好一会儿，一股大风吹来，警卫员小吴浑身觉得一阵阵冰凉，忽然想到主席。轻轻一摸毛泽东的衣服，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不断地往下滴着水。为什么雨水单单往主席的身上飘洒呢？他仰起脸一看，原来这一大阵工夫，主席不但没有休息，反而不时地随着风向的转变，一会儿把雨伞遮在这个同志头上，一会儿又把雨伞遮在那个同志头上。毛泽东为了给战士们遮雨，把伞的破处对在自己头上。

小吴看到这情景，一股热浪涌上胸膛。他小声地向毛泽东恳求说：“主席，这伞由我来撑吧！我们都年轻力壮，您怎么照顾起我们来了？”说着，他顺手把伞接过来，撑在毛泽东头上。

小吴说话的声音虽然很轻，但还是把几个同志惊醒了。他们知道这件事后，心里都十分激动。这个说：“主席，我们把您围在中间，是想让您休息得好一点，可没想到……”那个说：“主席，我们对您这样不注意自己的身体有意见！”

毛泽东笑着说：“好！好！我接受大家的意见。这也是互相帮助，我不是被你们围在中间，有你们给挡风嘛！”停了一下，毛泽东又接着说：“抓紧时间休息吧，天亮还要继续行军呢！”这样大家才不再说什么了。

小吴打着雨伞，看着毛泽东慈祥的面容，又想起了一件难忘的往事。那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毛泽东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看见一个战士负了伤，便冒着炮火跑了过去，扯下自己的

衣襟，给他包扎伤口。包好后，他就背着战士往后边的卫生队送去。那个战士觉得背他的这位同志好像在哪里见过，就问毛泽东是做什么工作的，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我们都是红军！”

是的，毛泽东是红军统帅，同时又和红军战士一个样，与大家心连着心。想到这里，小吴感到浑身暖烘烘的，又往前挪了挪，紧紧地偎依在毛泽东身边睡着了。

1935年6月，红军飞夺泸定桥后，在汉源击溃了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等地，翻过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藏族地区的达维，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红军在达维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懋功后，按照指示，全军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凡是红军住区，处处都能听见红军宣传员的洪亮爽朗的声音，他们一方面向战士讲解民族政策，一方面介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毛泽东也变成了一个宣传员。他像通过苗族地区和彝族地区时一样，在懋功住下的第二天，就把警卫员召集在一起，说：“我们中国边境地带，聚居着几十个少数民族，现在来到藏族地区了。藏族同胞和苗族、彝族同胞一样，都是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特别是四川军阀部队，到处烧杀掠夺，残酷迫害藏族同胞，藏族同胞对四川军阀恨之入骨。可是，他们对我们红军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要和他们团结成兄弟一般，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打倒军阀统治。”

在懋功住了两个晚上后，红军就向毛儿盖出发了。从懋功到毛儿盖的行军路程，大约有几百里。这个雪山区域，果然和毛泽东预料的一样，是红军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一段路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和欺骗，藏族同胞都躲藏起来了。这就使